

深刻把握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在文化繁荣发展中的基础性意义

□ 沈壮海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础,对赢得国际文化竞争的战略主动具有重要意义。“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举措。要深刻把握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在文化繁荣发展中的基础性意义,更好担当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文化体系的基础性意义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在文化实践活动中,人们对知识的研究与探索由来已久。中国古人使用“知识”一词与今义有所不同,然而知、智、学问等字的含义,则与今人对知识的理解颇为相通,比如,“致知在格物”“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谓之智”“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阐明了知识与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知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各种各样的知识按照内在逻辑、学科结构、实践功能等构成的有机整体,就是知识体系。

知识体系事关文化体系的成形、发展和延续。日常生活中有时将知识与文化通用,认为一个人有知识就是文化,虽然存在内涵把握不深刻的问题,却形象展现了知识体系在文化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一定文化体系中的知识体系,既是文化体系发展成果的核心精髓,又是支撑文化体系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骨骼。知识体系植根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实践,充分汲取文化发展的养分,以原创、鲜活、丰富、系统的理论知识,集中彰显文化共同体的思维能力和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从理论上高度概括文化体系的核心特质与精神内核,是文化体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知识体系承担着阐释历史、总结规律、塑造价值等重要功能,为文化体系的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提供核心支撑与强大动能。

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文化繁荣是文化体系具有生命力的鲜明体现,也是文化体系发挥灵魂作用的必然要求。文化繁荣不只体现为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数量质量的极大提升,更体现为思想立得住、价值站得稳、话语说得通、精神有根基。实现文化繁荣,需要经济基础、制度保障、科技变革等多方面条件的共同支撑。在诸多条件中,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基础性条件,因为它能够确立文化主体性、提供思想内核、筑牢文化根脉、夯实主体根基。

精神上的主动性、独立性,是文化繁荣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来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以马克思主义最新,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立足中国历史传统与现实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在知识层面的高度凝练。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坚持以中国立场、中国问题、中国实践为根本,确立文化上的主体性,能够提升文化自觉、增进文化自信、强化文化认同、凝聚思想共识,为文化繁荣提供稳固的精神支撑和不竭的精神动力。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只有深厚的思想繁荣、理论繁荣,才能支撑形成更多有深度、有高度的文化作品。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能够为文化繁荣做好理论准备,提供思想引领、学理支撑和方法指引,为文化繁荣提供深厚思想资源。文化繁荣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扎根自身文明传统。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把马克思主义思想

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并对中华民族的精神资源和丰富智慧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能够为文化繁荣筑牢根脉根基。文化繁荣离不开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广泛激发,离不开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的培养,而这些都有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授、学习与掌握。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能够系统培育文化主体的认知能力、实践能力、创新创造能力,提升国民文化素养,夯实文化繁荣的主体根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攀登文化高峰,必须有成熟系统的自主知识体系。我们必须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着力做好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理论阐释,科学回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交流合作等方面的工作,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新时代中国所进行的开拓性伟业、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是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要进一步回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入阐释中国发展新方向、新逻辑,总结提炼规律性认识,深入研究我国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不断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学术生长点,推动各学科的发展以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

文化交流互鉴的基础性依托

人类文明的进步,离不开文化交流、互学互鉴。当今时代,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而且逐渐从表层的文化符号展示、文化作品传播、文化形式借鉴,走向更深层次的文明对话、价值沟通、思想碰撞。

在此背景下,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为推动不同文化体系更加平等、更加自主、更加开放、更可持续地参与文化交流互鉴的基础性依托

文化交流重在寻求深层次的文明对话、价值融通与思想共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本质上是基于各自原创的、系统的知识体系所进行的交流互鉴,势必内蕴着知识的传播与融合。一种文化能否在交流互鉴中站稳脚跟、赢得尊重并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关键在于其是否拥有自主的、成熟的知识体系。缺乏自主知识体系,在文化交流中只能被动接受、简单复述、盲目跟从,既无法确立平等对话所需的主体地位,也无法以自身认知框架理性鉴别、批判吸收外来文化,更不可能为其他文明提供有益启示。这样的文化交流,不仅无益于自身文化的对外传播,反而可能在文化激荡中迷失方向,被同化、被消解,丧失文化主体性。因此,我们要打开学术视野、秉持人类情怀,构建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共性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说服力、阐释力、传播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感召力、影响力。

新时代以来,我们坚持自信自立、开放包容,在文化交流互鉴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需要清醒看到,我们还面临着文化传播停留在表层文化符号,文化特色被误读、被消解等困境,深层原因在于知识体系方面的主体性、原创性以及说服力、阐释力、传播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这要求我们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打造易于国际社会所理解 and 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大国担当,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把目光投向中国,渴望读懂中国道路、汲取中国智慧,并在此基础上寻找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方案。这同样要求我们善于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在讲好故事的同时讲好道理,以“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为破解人类共同难题、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原载5月18日《人民日报》)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赋能文化产业

□ 周建新

随着我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深入实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文化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窗口期和战略机遇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打造更多文化精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丰富资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赋能文化产业,有助于培育产业新动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文化产业,重点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审美理念等元素,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融入文化产业的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等全链条,实现文化资源优势向发展优势的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价值理念有助于丰富文化产品的精神内涵,提升文化产品的精神品质,避免价值迷失、内涵空心化、过度商业化、泛娱乐化等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IP、传统技艺、民俗风俗等元素,能够为文化产业提供丰富的创作素材,增强内容供给,从而在市场中形成鲜明的辨识度与竞争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赋能文化产业,要在坚守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精神内涵的基础上,立足当代审美需求与技术发展,创新表达形式、传播方式与产业形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深入活化利用,夯实文化产业内容根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文化产业发展,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性挖掘、精准化提炼,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活起来”,从静态的资源变为鲜活的产品。坚持分类施策,针对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源,采取差异化活化路径。在保护好文化资源前提下,打破静态保护思维,推动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利用,通过研学旅游、沉浸式体验等,让游客在参观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让非遗走进生活场景,以“非遗+旅游”“非遗+体验”等方式,实现活态传承,赋能文化产业发展。加强全产业链开发,有效延伸经典文化IP价值,打造影视、动漫、游戏、文创等系列产品,形成“IP内容—产品开发—市场传播—消费体验”的路径。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提炼,深入阐释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涵,并将其应用于不同产品形态与消费场景中。例如,当前受到年轻人喜爱的“国风音乐会”“非遗市集”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可参与、可分

享的社交仪式与消费场景,在互动体验中增强共鸣感、认同感、归属感。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拓展产业发展边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消费、农业、旅游等领域深度融合,培育数字文化、国潮文创、乡村研学等丰富多样的文化业态。

强化科技赋能,创新传统文化现代表达。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新路径、新手段。可系统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情况,对文物、非遗、民俗、传统技艺等进行数字化采集,建立文化资源数据库,实现文化资源的精准建档、动态管理和高效检索。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借助技术赋能与叙事重构,重构传统文化的生产、传播和体验方式,让传统文化可感、可触、可互动。可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文物修复、场景复原、举办数字展览等,打造沉浸式、互动式、参与式场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传统文化内容创作创新,提升产业生产效率和创新力。例如,人工智能文创设计平台能够快速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设计,开发出符合大众需求的文创产品;人工智能语音合成、虚拟人技术能够让历史人物“开口说话”,实现传统文化的个性化、互动式传播。

完善保障体系,筑牢产业发展支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赋能文化产业,涉及资源开发、产品创作、产业培育、市场推广等多个环节,需要政策、人才、市场、金融、法治等多方面协同发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保障体系。要加强政策引导和法治保障,出台支持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非遗振兴、文旅融合、文创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加大扶持力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强对非遗、文化IP、传统工艺等的版权、商标、专利保护,打击侵权盗版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文化+创意+科技+经营”的复合型人才,支持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交叉学科,鼓励大师带徒、校企合作、返乡创业,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定期组织开展传统文化、数字技术、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培训,提升基层文化工作者、非遗传承人、乡村文化人才等的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强化市场与金融支撑,搭建文化产业交易平台,举办文化产品博览会、文创产品交易会、非遗展演等活动,为文化企业、传承人提供展示、交流、交易的平台,拓宽文化产品的销售渠道;培育壮大各类文化市场主体,扶持一批具有竞争力的文化品牌和文化企业。

(原载5月19日《人民日报》)

提升精准度、均衡度、参与度 有效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 王永友

优质公共文化资源是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提高人民群众文化修养的重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更多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促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有效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要在促进服务重心下移、资源主动下沉上下功夫,从政府文化供给、群众文化需求、社会组织协同、政策机制保障、技术创新等多方面发力,为基层群众提供更加优质、更加公平、更加均衡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促进人民群众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锚定需求导向,提升公共文化供给精准度。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群众文化需求快速增长、结构深刻变化,呈现出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的鲜明特征。面对持续增长的文化需求,必须进一步弥补短板,推动文化供给与需求有效供给,推动文化供给与需求精准适应,加强优质文化的有

效供给。要提升文化供给的针对性,健全文化需求精准采集机制,运用大数据采集、基层调研等方式,动态把握不同区域、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文化偏好,了解基层群众缺少哪些文化资源、基层群众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变“政府端菜”为“群众点餐”。例如,浙江武义打造“共富百花会”,基层群众实现手机便捷“点单”,建立起文化需求及时响应机制,实现优质公共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供给、智能化配送,使基层群众更高效、更直接地享受到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全面提升优质公共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效能。丰富优质文化资源的种类、形式、内容,大力扶持原创精品创作,培育精品公共文化项目,推动线上线下文化场景融合,发展数字文化、文创产业、沉浸式体验等新型业态。

缩小城乡差距,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农村现代化,不仅物质生活要富裕,精神生活也要富足。”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全域推进、成效显著,但城乡公共文化发展仍不均衡。要破除城乡二元结

构带来的文化壁垒,构建城乡一体、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的供给格局,从根源上破解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不均衡难题,让优质文化资源普惠惠及城乡群众。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网络,有效增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总量,建好用好农家书屋、文化礼堂、乡村戏台等场所,建设基层综合文化服务阵地,避免设施空置、功能虚化、配套滞后,筑牢均衡发展的硬件底座。开展符合农村受众群体特征和选择偏好的文化供给。例如,在多地开展的“村晚”“村BA”等“村字号”文体活动,吸引广大村民积极参与,实现优质文化资源与受众群体文化偏好相匹配,确保直达基层的优质文化资源真正贴近基层、贴近群众。推动乡村特色文化“进城”与城市优质资源“下乡”,在城乡联动中实现优质文化资源的双向流动与双向赋能。例如,山东日照打造“社区文化书院+乡村文化小院”,开展“四季村晚”“社区文艺展演”等活动,精准化、常态化为群众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

构建协同生态,提高社会力量参与度。有效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直达

基层,需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多方协同体系,让优质公共文化资源真正沉下去、留得住、用得好。强化政府统筹协调职能,构建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工作格局,打破部门壁垒,推动各类资源向基层倾斜,向群众聚集。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解决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的准入门槛高、参与渠道窄、激励机制不足等问题。深化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改革,将文艺演出、数字文化服务等项目纳入常态化采购,面向社会组织、专业院团、文化企业等开放市场,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引入竞争,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例如,河南省周口市坚持10余年开设“周末公益剧场”,探索“政府主导、公益性质、综艺形式、签约化演出、社会化投入、品牌化发展”路径,通过企业冠名、联办专场等形式吸纳社会资金。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激励机制,加大对优秀文化组织、文化企业的扶持力度,完善税收优惠、荣誉表彰等政策,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主动投入基层公共文化建设。

(原载5月14日《人民日报》)

提高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构建高效协同智慧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 张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生态环境法典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能力建设,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充分赋能生态环境治理,构建高效协同智慧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保障生态环境法典精准实施。

完善智慧监测体系,提升生态环境监管效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健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加强生态环境监测是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能力的前提。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发展应用,能有效拓展生态环境监测的时空范围,提高信息传输处理效率,有助于实时掌握生态环境变化趋势,强化生态环境人为活动影响监管,精准识别违法行为、固定违法证据。

实现对生态环境状态的全面监测和快速响应,可从以下方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信息化水平。一是织密监测网络,深入推进生态环境要素监测全覆盖。依托卫星遥感、航空观测、水下机器人、物联网等多样化信息采集技术,建立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全面掌握大气、水、土壤、海洋等各类生态环境要素状态。二是强化全过程监督管理,建立信息化监管体系。对重点管控新污染物建立包含产生、收集、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各环节的全过程信息化监管体系,动态掌握非现场物管控防治信息,强化智能预警能力。三是推广非现场监管,实现重点行业企业在线监管。通过布设传感器、视频监控等方式,实施问题线索智能巡查、执法任务线上检查等“无感化监管”,促进执法方式从“人防为主”向“技防优先”转变,在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同时,全面提升监督管理效能。

实现数据互联互通,推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目标协同、多污染物控制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政策协同,不断增强各项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生态环境各要素相互关联、不可分割,高度系统性和协同性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内在要求。要坚持系统观念,运用数字化手段推进协同治理,统筹兼顾、整体施策。推动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工业和数字化、水利等多领域跨部门数据互联互通和执法协调统一,实现系统集成,筑牢生态环境数据底座,促进生态环境治理格局从“分散作战”向“整体协同”跃迁。

数字技术嵌入生态环境治理,关键在于打破数据壁垒,实现整合共享,充分发掘生态环境数据资源价值,驱动生态环境执法体系重构和模式优化。一方面,加快绘制就全国生态环境数据“一张图”,将自然资源、污染排放、生态修复等监测数据归集整合,促进数据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共享流通,以“数据多跑路”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另一方面,建设生态环境统一监管平台,针对跨部门、跨区域的生态环境违法问题,建立健全线索移送和联合调查机制,形成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合力,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守护绿水青山。

强化智能分析应用,保障生态环境精准执法。生态环境治理智能化以高质量的数据资源为基础,以安全高效的算力体系为支撑,以先进的算法模型为核心。要加快建设智慧执法平台,着力研发具备感知预警、指挥决策、精准管理和即时响应能力的生态环境算法模型,通过对海量生态环境数据的融合分析与深度挖掘,为科学治污、精准治污提供坚实数据支撑和精准决策参考,推动生态环境执法实现从“经验判断”到“数据分析”的智能化转型。

一是强化智能识别与精准溯源。基于对多源数据的智能感知和比对分析,精准识别和追溯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及时向执法人员推送偷排偷放、篡改监测数据等违法线索,提高监测预警和执法响应速度,实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早识别、早处置”。二是运用人工智能辅助生态环境执法。在智慧执法平台中嵌入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重点行业现场检查指南,辅助执法人员精准适用法律、规范执法程序。依托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和类案分析,为行政执法提供精准裁量建议,确保过罚相当、裁量有据,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三是深化算法模型研发和多场景应用。以高质量的生态环境数据和专业知识优化算法模型,持续提升其智能化水平。同步发展生态环境通用大模型和面向具体场景的专业模型,增强人工智能针对污染防治、生态修复、风险预警等具体治理任务的专业应用能力,使其能够深入研判生态环境问题成因和演变趋势,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科学的决策建议,以精细化治理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关系。

(原载5月15日《人民日报》)

“主心骨”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注脚

□ 陈和香

政绩观是面镜子,不仅映照出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更决定了其在群众心中的分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面对工作难题,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对策,豁得出去、顶得上去,真正成为带领人民群众渡难关、渡难关的主心骨。”“主心骨”三个字,分量千钧。它不是职务赋予的,更不是自封的,而是在一次次风险考验中干出来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领导干部不只会风平浪静中守摊子,更要在风高浪急时让群众信得过、靠得住。

豁得出来,靠的是闯劲。群众把领导干部当作主心骨,并不是看职务有多高、表态有多动听,而是看风险面前敢不敢冲、难题面前能不能顶、群众的急事难事上不上心。这种关键时刻豁得出来,比任何表态都更有说服力。现实中,少数领导干部抱持“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心态,遇到难题绕着走,碰到风险躲着行。在他们看来,“不决策”就不会决策失误,“不干事”就不会做错事,“不出头”就不会被问责。这种逻辑背离了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一个地方发展没有起色,百姓急难愁盼无人过问,这样的“太平官”当得起“稳”,群众的信任度就越“低”。主心骨,关键时刻就得挺身而出,敢拍板、能定夺、肯担当,让群众心里有底。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守”出来的,而是在惊涛骇浪中“闯”出来的。

顶得上去,凭的是本领。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光有“偏向虎山行”的胆量还不够,还得有识“虎”之能、破局之策。真正的担当不是盲目硬干,而是要求调查研究要深、对策措施要实、破解办法要准。焦裕禄之所以能成为兰考人民的主心骨,不是因为他会喊口号,而是因为忍着病痛跑遍全县100多个生产大队,摸清了“三

(原载5月14日《人民日报》)